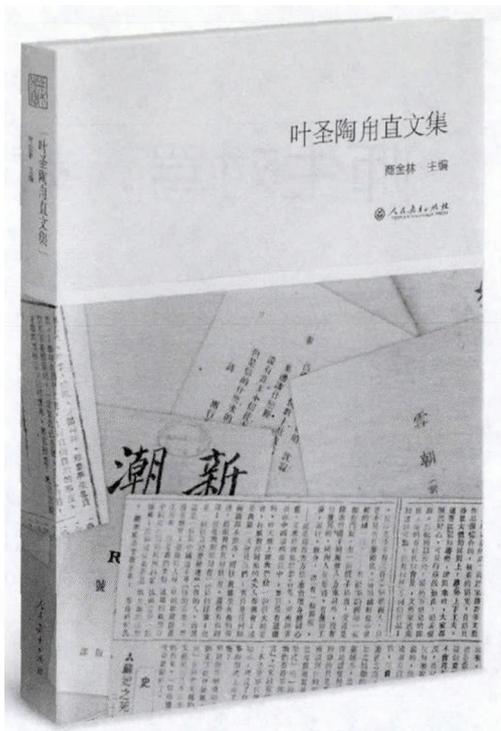


DOI:10.19402/j.cnki.zgms.2017.11.027

叶圣陶在水乡古镇甪直

□ 商金林



1917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帷幕。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以一位老革命党的口吻，下达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在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策应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革新浪潮风起云涌。

叶圣陶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氛围中，于1917年3月从上海来到苏州的水乡古镇甪直，担任吴县第五高等小学（简称“五高”）教员。1919年7月又把家从苏州搬到甪直，夫人胡墨林担任了五高女子部的级任教员。从此，一家人过上了极富水乡情调的乡村生活，成了地地道道的甪直人。1921年秋，叶圣陶应邀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执教，随后又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执教，但家仍在甪直，胡墨林仍在五高女子部任教，直到1922年秋才把家迁回苏州，叶圣陶在甪直生活了将近五年半。

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

叶圣陶撰写的有关甪直生活的回忆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心是

分不开的》(收入《叶圣陶集》时改名《好友宾若君》)。顾颉刚与吴宾若和王伯祥也都是中学同学,彼此亲密无间,“犹如亲兄弟一样”,所以评说起来当然特别真切到位。他在《〈隔膜〉序》(叶圣陶:《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中谈及叶圣陶到甬直后大刀阔斧地实施教育改革的计划时说:

他(叶圣陶)在这几年里,胸中充满着希望,常常很快乐地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改革情形。他们学校里,立农场,开商店,造戏台,设博览室,有几课不用书本,用语体文教授……几年内一步步的做法,到如今都告成功了。这固是圣陶的一堂同事都有革新的倾向,所以进步如此其快,但圣陶是思想最锐敏的,他常常拿新的意见来提倡讨论,使全校感受到他的影响,这是无可疑的。

自五年到现在,六年之间,他没有离开过甬直。八年,又把全家搬了过去,从此他做了甬直人了,他每天所到的地方,只有家庭及学校,而这两处都充满了爱的精神,把他浸润在爱的空气里。于是,他把民国四年以前的悲观都丢掉了,从不再说短气的话。社会的黑暗,他住在乡间,看见的也较少了。于是他做的小说,渐渐把描写黑暗的移到描写光明上去了。

叶圣陶和同事们创办的农场,叫“生生农场”。“生生”两字指的是先生和学生,师生共同开荒种地,培植玉米小麦和瓜豆菜蔬,让学生在“学农”的过程中锻炼筋骨,磨练意志,懂得“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长篇小说《倪焕之》第一章写到的两棵高高的古银杏,就在“生生农场”的旧址上。开办的“商店”由学生经营,引导他们在书籍纸张笔墨的买卖中学会算账和“做生意”。听说还办过“银行”,也是由学生来管理,把压岁钱和零花钱存起来,养成勤俭的好习惯。“博览室”汇集当地的文物,激发学生热爱乡土的感情。“造戏台”当然是为了演戏,让学生通过排戏演戏,学会表演,懂得欣赏。据学生回忆,叶圣陶指导他们编演的

戏剧有《最后一课》、《荆轲刺秦》、《完璧归赵》等剧目。学期中和学期末开“恳亲会”,学校把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以及种植的瓜豆菜蔬陈列出来,请学生家长和社会贤达来校观赏,那情景比到乡下看草台戏还热闹。

至于“有几课不用书本,用语体文教授”,这在现代教育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用书本”,侧重于“口说”和“田野调查”;“用语体文教授”就是“说”和“写”都用白话。纵观叶圣陶在甬直推行的这一系列改革,其总的思路是注重培育学生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的品质以及集体主义精神和协作的意识,把书本和实践结合起来,手脑并用,把单纯的学习“知识”转化成为对于潜能的激发以及“创造力”的提升。这一系列改革当然不会一帆风顺。长篇小说《倪焕之》和独幕剧《恳亲会》写到的“开辟农场”引发的风波,那是以创办“生生农场”的经过作为依据的。

在荒地上开辟农场须得“迁移”几穴“无主荒坟”。旧势力恶意煽动,说校长“贪图自己舒服,发掘了人家的祖坟,在学校里造起花园来,专供教员们享乐”,要状告校长“盗掘坟墓”、“占夺地产”。还说什么“惊扰坟墓里的骸骨”,会“搅一个全镇瘟疫”。学生的家长也很反感,他们说:“我们只要子女读书,并不要他们种田。”“他们只须注重国文、英文、珠算三科”,“国文预备写信记账,英文预备发洋财,珠算预备习商”,将来就得靠这三科“吃饭”,“什么体操,什么唱歌,什么手工图画”,非但不要,而且讨厌,“演戏,奏乐,农作”,尤其是农作,他们更深恶痛绝。迁荒坟,辟农场,在古镇上惹起轩然大波,“教育改革”瞬竟成了众矢之的。是叶圣陶用他的人格和魅力渐渐地感化了古镇四周的乡民。

叶圣陶把家迁到甬直后,赁居东市陈继昌家的怀仁堂走马楼。这里“距五高三里许,到校有两途可循,一沿河岸西行,复折而西,

一则曲折循田滕行，出眠牛径即为保圣寺天王殿之旷场，比较近捷”。叶圣陶和夫人胡墨林就是“曲折循田滕行”，每天往返四次，他真诚地认在田间劳作的农人做朋友。短篇《阿菊》（原名《低能儿》）写镇上穷人家的孩子阿菊上学第一天的心理活动，他对学校里非常普通的事物、对老师的爱都觉得新奇。阿菊的原型就是住在保圣寺前面的阿虎，家境贫寒，父亲在外帮工，替人家操办红白喜事，瞎眼的母亲在家搓草绳。阿虎在“黑暗的墙角”里长大，成了不识数的“低能儿”。叶圣陶得知后，就出钱供阿虎上学。叶圣陶和胡墨林就是这样，以他们特有的谦诚可亲的品格、博学多艺的才能赢得了甬直人的敬重。那时，胡墨林除在女子部教语文外，还兼教家庭生活课，她讲授的各种剪裁技艺，很快在甬直镇传开了。晚间，常有三五成群的姑娘来串门，胡墨林热心地教她们学描剪花样、裁缝针织等。叶圣陶在学校里开设篆刻课，课上课余，热心地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刻诗文互赠，刻花鸟共娱，家长们知道后也纷纷登门求印。

“描剪花样”、“篆刻图章”又使得叶圣陶的心和甬直人贴得更紧，教育改革也就水到渠成，一步步地取得成功。当年的五高，北依吴淞江，西枕甬里塘，校外小桥流水，张陵山清晰可见，校内花木扶疏，早船假山，古柏参天，是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乐园。甬直镇上最早参加革命的陈继昌烈士和戴宗盘烈士，都是叶圣陶的学生。他们念书原本是为了识字算账，长大了好做生意。是叶圣陶激励他们毕业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了他们革命的启蒙老师。

叶圣陶曾经说过：“我真正的教书生涯是自甬直开始的。”他在甬直编写过高年级国文教材，课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翻译作品，如莫泊桑的《两个朋友》（即《二渔夫》）、《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易卜生的《娜拉》等；二是古典名作，如宋濂的《王冕传》、顾炎武的《与友人论学书》、

魏学洵的《核舟记》、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等；三是根据名作改写的语体文，如根据《史记·刺客列传》改写了《荆轲刺秦王》，根据袁宏道的《虎丘记》改写了《苏州虎丘》、根据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改写了《苏州五人墓》，等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鲁迅的《孔乙己》、《故乡》；胡适的《一颗星儿》；周作人的《小河》、《生活之艺术》；沈尹默的《三弦》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品也被叶圣陶编入国文课本。每篇选文的后面都附有题解、作者传略及语释，每隔两篇选文，就有叶圣陶写的一篇文章，用讲话的体裁谈文章的写作和欣赏等，内容充实，议论缜密，文笔活泼。叶圣陶认为“教材”是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一种“适用的工具”，结合他当年发表的教育论文，可以看到他自编的教材“切合人生”、“务求活用”、“力戒板滞”，有益于学生“为学立行”，“把读书得来的经验，去体验四周的事物，来创造自己的新经验”，因而深受学生的喜爱和教育同仁的推崇，从而奠定了他在教育界的地位，被誉为现代语文教育的“先驱者”。

叶圣陶给了水乡古镇无私的奉献，水乡古镇也给了叶圣陶丰厚的回报，成了他文学创作的摇篮，让他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叶圣陶在《诗的泉源》中深有体会地说：“生活是一切的泉源，也就是诗的泉源。”“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一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因而诗的泉源也比较的丰富。”

新潮社开创

“新体小说创作风气”的奠基人

1918年11月19日，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及社会中各种问题为职司。第一批入社

的大多为北大文科学生，中国文学门有傅斯年、俞平伯；英国文学门有罗家伦、潘家洵；中国哲学门有顾颉刚、谭平山、陈家藹、吴康等。以建设“新文学”为己任的叶圣陶不仅于1919年3月加入了新潮社，而且成了新潮社开创“新体小说创作风气”的奠基人。顾颉刚在《〈隔膜〉序》中对叶圣陶作了精辟的论述：“圣陶禁不住了，当《新潮》杂志出版时，他就草了《一生》一篇寄去，随后又陆续做了好几篇。可喜《新潮》里从事创作的，还有汪缉斋、俞平伯诸君，一期总有二三篇，和圣陶的文字，竟造了创作的风气……”

《一生》原来的题名为《这也是一个人！》（编入短篇集《隔膜》时改名为《一生》）。小说采用写实的手法，叙述了一个经历类似祥林嫂的农村妇女“伊”苦难的一生。“伊”幼小时“简直是很简单的动物”。十五岁那年出了嫁，婆家用“伊”来“抵半条耕牛”使唤。“伊”忍受不了丈夫和婆婆的虐待，逃到镇上当佣妇，还萌生过离婚的念头。而父亲却用“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骂，概由人家”的“理由”，强迫“伊”回到婆家。“伊”的丈夫死后，婆家就把她卖了，“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

“伊”是我国现代小说中“第一个”女性受难者的形象，她的悲惨的命运将农村劳动妇女的解放问题，提交到社会改革家的面前，向封建宗法社会发出了“这也是一个人！”的控诉。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谈到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叶绍钧等新潮社一批作家时，认为这群作家中“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48页）

鲁迅的赞誉对叶圣陶说来是莫大的鼓舞。从此，叶圣陶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古镇特有的市街、石埠、田野、河流、丛树、屋舍、店铺、快船、殿宇，以及“卷

舒自如的炊烟”、“山水画样的白云”等可爱的景色给了叶圣陶以美的享受；古镇特有的茶馆、酒肆、集市、风情，以及“躯干高大且挺直”的农夫、“臂弯里挂着篮子”的农妇、“别有一种健美的风致”的村姑，乃至阶前的绿草、窗外的蝴蝶和秋虫凄凄切切的声息，都触发了叶圣陶创作的灵感。“做了甬直人”的叶圣陶怀着要“使‘五四’曙光更光明更普遍”的热忱，创作了短篇集《隔膜》、《火灾》，童话集《稻草人》以及一大批散文、新诗、评论和《恳亲会》、《艺术的生活》两个剧本。长篇小说《倪焕之》的前十九章的素材也大都来自甬直。叶圣陶早期的作品讴歌“人的觉醒”，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寻求“光明”的、充满了“美与爱”的“别一世界”，虽说有的作品也富有浪漫色彩，但那的确是他在甬直期间真实的感悟。1930年创作的短篇《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万盛米行”也是以甬直的万盛米行为原型的。

叶圣陶加入新潮社后，在甬直开设《新潮》杂志甬直“代办处”，销售《新潮》杂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19年5月5日，叶圣陶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学界声讨卖国贼，要求“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的报道，彻夜未眠。他觉得天地间最重要的是“民气”，就和王伯祥等人一起商讨唤起民众的计划。第二天，在“五高”操场召开“五四”宣讲会。会上，叶圣陶作了题为“独立与互助”的演讲。王伯祥作了题为“社会的国家和官僚的国家有什么分别”的演讲。顾颉刚认为他们的选题是在根本上立说，指明此次风潮之原因，较一般“上海罢市的情况”、“北京学生受苦的情况”的演说所得的效果好得多。宣讲会结束时，叶圣陶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似乎要点燃每个听众的爱国热情。沉睡了千余年的古镇给唤醒了。从此，“自由”、“自觉”、“改造”、“解放”等新词在古镇流传开来。

将改造社会作为自身责任

宣讲会刚刚开过，叶圣陶就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亲近军阀和日本人，被同学逐出的传闻，立即给顾颉刚写了快信询问究竟，并限定顾颉刚接信次日即须将复信付邮，竭诚地希望有志之士不要“自杀文化发展力”。顾颉刚在5月9日的回信中，除了回答叶圣陶的提问，还敦促叶圣陶将风潮扩大。叶圣陶也是这么想的。正是出自“改造社会”是“自身责任”的这个“觉悟”，叶圣陶在《时事新报》发表了《吾人近今的觉悟》。文章宣传“庶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提出“凡是和‘庶民主义’、‘社会主义’反对的，都要去反对他”；指明改造世界的第一步就是要推翻“强权称雄”的“中国政府”，铲除“他国政府”的“强权欲的冲动”；激励人们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反对在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自居第三者地位”；坚信只要我们不怕“强权”，“只要真能自觉，真能奋斗，最后胜利终属我们”，“我们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个‘我’”，这些重要的见解与革命先驱者李大钊等人的思想十分相似，尤其是“只重在一个‘我’”中的这掷地有声的一个“我”字，在当年可称得上是“人的觉醒”的象征，是时代的“惊雷”！

这之后，为了声援北京、上海等地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叶圣陶和同事们“停课”宣讲；还到甬直第一、第二国民学校串联，联名发表了《甬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用“罢课”来声援北京大学学生爱国行动。长篇小说《倪焕之》中写到倪焕之与几个学校串联罢课，就是以这件事为背景的。与“五四”弄潮儿有所不同的是，叶圣陶既热血沸腾的关心“国运”，又深深扎根于水乡古镇，关心民间的疾苦。

他1920年3月1日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新诗《地主》（编入《叶圣陶集第八卷》）。这首诗并不长，可地主阶级的狡黠凶

残，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类似《地主》这样描写阶级压迫，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文学作品，大多出现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后。叶圣陶的这首《地主》是“超前”的。这固然与他的思想前进有关，可更重要的在于他“生活”的扎实，是古镇甬直使他对中国乡村有了更直接更真切的认知，从而使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写出了像《地主》这样的“血泪文学”，为随后兴起的“乡土文学”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1921年1月4日，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圣陶、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这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已经从一般的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支独立的队伍。文学研究会的成立，预示着“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现代文学进入了各种流派竞相发展的新时期。1921年3月底，因郑振铎的南下及文学研究会的好多位作家聚集到上海，文学研究会的重心也由北京南移到上海，并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当时，叶圣陶虽说还在甬直执教，但与上海靠得很近，来往方便。1921年4月上旬，叶圣陶到上海鸿兴坊沈雁冰的寓所，与沈雁冰、郑振铎、沈泽民会晤。他后来在1945年写的《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叶圣陶集》，第九卷，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28页）一文中谈及这次会晤，并提到他们“商量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丛书》包括《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文学研究会丛书编例》和《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是一份较为宏大的出版规划。这《文学研究会丛书》连同他们四人同游半淞园拍摄的照片，都是文学研究会极其珍贵的史料，也是叶圣陶参与文学研究会领导工作的见证。这之后，文学研究会会

刊《文学周报》的创刊、文学研究会代理会刊《小说月报》的改进和发展，也都凝聚了叶圣陶的热忱和辛劳，他与沈雁冰和郑振铎也成了一辈子心心相印的挚友。

1921年9月，叶圣陶应上海中国公学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的邀请，到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国文，同时应邀的还有刘延陵和朱自清。他们三人都写新诗，于是就有了创办《诗》月刊的动意。1921年10月18日—20日连续三天，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登了叶圣陶写的《〈诗〉底出版底预告》，形式很特别，是用一首短诗写成的：

旧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

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

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

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的美丽呀？

我们拟造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

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他们的力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说的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新诗的成绩不尽如人意，还没有专门的新诗刊物，用叶圣陶的话说是缺少个培育新诗的“歌舞养育之场”。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公学闹风潮，叶圣陶、刘延陵和朱自清等“新教员”受到打压和排挤，《诗》月刊被迫拖延至1922年1月1日才创刊，1923年5月15日停刊，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共出了两卷七期（第一卷五期，第二卷两期），名为“月刊”，因种种原因未能按时出版。

这一年半，叶圣陶“东奔西跑”。1921年10月，中国公学风潮结束后，叶圣陶应邀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与朱自清“击桨联床共曦月”，度过了“两个月”美好的时光。

1922年2月，他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文系主任马裕藻的聘请，到北大任教。可只教了一个多月就回苏州了，因为要陪夫人胡墨林到医院分娩。1922年秋，叶圣陶把家从甬直搬回苏州。1923年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文部当编辑，把家搬到上海。《诗》月刊的“投稿地点”随着叶圣陶的履迹而迁徙。

《诗》月刊第一卷第三号的《投稿诸君鉴》中说：“今请以后诸君惠稿，都寄苏州甬直叶圣陶收。”《诗》月刊第一卷第四号卷首《一个启事》中说：“叶圣陶收移处改为苏州大太平巷五十号。”叶圣陶在甬直主编过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从此，处在“筚路蓝缕”时代的新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刊物，新诗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从上海来到古镇甬直，又从古镇甬直回到上海，叶圣陶的这个“回归”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前面已经说过，叶圣陶从上海来到古镇甬直是为了寻找教育改革的基地和新文学创作的源泉。而在甬直教育改革的成功和新文学创作的丰硕，不仅使得叶圣陶誉满全国，也使得时代对他发出了新的召唤，希望他来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开拓奋进，引领未来。古镇甬直造就了叶圣陶的这个“传奇”。叶圣陶说“甬直是他的第二个故乡”，说他的教育生涯“从甬直开始的”，以及甬直人所说的“甬直是叶圣陶的摇篮”，都极形象而又生动地讲述着古镇甬直对叶圣陶的意义。

可见，把叶圣陶在甬直写的作品汇集起来，编成这本厚厚的《叶圣陶甬直文集》，无论是作为故乡人民对于“乡贤”叶圣陶的纪念和缅怀，还是作为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于甬直的回忆，都显得格外珍贵，值得我们好好研读和传承。

（本文节选自《〈叶圣陶甬直文集〉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